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

李小荣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李小荣 著

《弘明集》《广弘明集》  
述论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李小荣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5. 9  
ISBN 7-80659-763-8

I. 弘... II. 李... III. 佛教史—研究—中国—古代IV. 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905 号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

李小荣 著

---

责任编辑	李 蓓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5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028)87427333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20. 75
字 数	500 千
书 号	ISBN 7-80659-763-8/B·132
定 价	32. 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序

陈庆元

梁僧祐《弘明集》和唐初道宣《广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两部极为重要的典籍，也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典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许多论著都不断加以称引。1994—1995年间，我校笺《沈约集》时，就曾充分利用《影宋碛砂大藏经》本《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有不少收获。对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的研究，前者的成果优于后者。日本学者牧田谛亮主编的《〈弘明集〉研究》和刘立夫博士的《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都是研究《弘明集》颇有创获的专著。而《广弘明集》的研究至今乃无专书问世。而且由于版本复杂等方面的原因，这两部典籍至今尚未见到整理本出版，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李小荣博士的《〈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是他在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所作的工作报告。该报告以《影宋碛砂大藏经》本为底本，参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华大藏经》本及其他相关版本，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这两部典籍结合起来进行了综合研究。《弘明



集》的作者僧祐，为南朝齐梁时代的律学大师。《广弘明集》的作者道宣，为唐初戒律大家。僧祐和道宣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佛学思想也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专家。《广弘明集》仿《弘明集》，对佛教文献的搜集有了进一步的增广。两书虽前后作，但性质相类。《弘明集》收文180多篇，作者122人；《广弘明集》收文300多篇，作者130余人，后者的容量大大超过前者，涉及的问题也多于前者。就时代断限而言，如果仅研究《弘明集》，则止于梁初；仅研究《广弘明集》，僧祐之前的文献可能难于兼及。就研究的问题而言，如果仅研究其中的一书，也可能顾此而失彼，较难融通。李小荣博士将《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两书合并研究，不仅贯通了东汉至唐初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限，而且研究视野也可比较开阔，研究的“点”也可能比单纯研究一书来得多些。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牟子理惑论》的真伪、产生年代及佛教初传时期的思想、社会状况；对永平求法史料及求法说成因的辨析；“化胡说”的由来、演变及其在佛教界的反应；夷夏论由来，汉至李唐的夷夏之争；轮回说在中土的流行及因果报应之争；印度佛教中形神观与中土的形神论以及两书中对形神问题的争辩；道教《灵宝经》与佛教经典关系问题。报告涉及了东汉至唐初佛教流播过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和重要的理论。

在对汉唐三教关系进行探源、分析时，作者于三教，尤其是佛教材料极其稔熟，引证翔实，论证缜密，故结论公允可靠。报告里有不少章节写得很有意思，例如第四章《夷夏论》长达9万多字，它不仅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土以来至李唐王朝各个时期的夷夏论争，而且详尽精细地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



民族掌握政权、中华民族在融合过程中汉族与相关其他民族之间的复杂的民族心理，以及对待三教的不同态度，很有一些精深的见解。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制定宗教政策仍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

报告在文献的考辨方面也是颇下了一些力气的，例如对《弘明集》材料来源与撰集过程的检讨，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明。此外，在一些细节方面作者也没有轻易放过，例如范泰《与生（义）观二法师书》中的义、观二法师，作者认为义为慧义、观为慧观；认为《三破论》的作者不是南齐张融；《三破论》已亡佚，小荣从刘勰《灭惑论》和释僧顺《析〈三破论〉》中的引文里采辑其佚文，然后加以详论。

小荣是江西宁都人，红土地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1999年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来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当时还不满30岁。小荣读博士期间师从复旦大学原中文系主任陈允吉教授。允吉先生是著名的佛教文学专家，写得一手优美的骈文，他主编的《佛经文学精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佛经文学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两书卷首都有他用骈文写的序，序文情辞并茂，是少见的佛教文学的好文论。我曾说过，将来有谁编20世纪文论选、或当代佛教文学文论选，此二篇似不当遗漏。小荣曾参与《佛经文学粹编》的工作，允吉先生不断地给予他热情的鼓励和指导。当然，对他的要求也颇为严格。小荣家境并不好，初中毕业后入中师，中师毕业后到小学任教两年。后来经过自学，先后获得专科和本科文凭，也由小学转到农村中学当教员。几经曲折，1993年他考取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师从郝世峰教授研



学、大学直至研究生院的话，当是1990年去读硕士研究生，但他推迟了三年，因此比同年入学的硕士生也许会大上那么两三岁。虽说比他们少了一些大学生的经历与体验，但是他多了许多研究生所未曾体味过的艰辛，多了一些谋生和应对生活的能力。正因为这样，他才特别珍惜三年硕士生的生活。其他研究生知晓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是怎么回事，通常在全日制普通高校时就已略懂一二，而小荣比他的同辈们却晚了半拍，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术研究的训练也是从研究生入学这一年才开始的。他不仅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而且还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其间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1999年博士毕业后，他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旋即又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随著名的敦煌学家张涌泉教授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2002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变文讲唱与华梵艺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第二部专著《敦煌密教文献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荣从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又到福建师范大学从事第二站的研究工作，2005年1月，出站报告《〈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顺利通过答辩。此份报告将交由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我的《诗词研究论集》也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合作教授，我为他高兴，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三部专著了。

从1993年踏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开始学步，到第一部专著的出版，小荣前后只用了10年时间；而第一部专著出版后的数年间，他又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小荣在佛学、敦煌学、文献学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就，并且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短短的十二三年间，小荣的学术研究为什么能有长足的进展？



我以为小荣的刻苦努力是第一位的原因。从中师毕业，到硕士研究生，跨度不能说不大。这期间，他要教书，要赚钱养家，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之余，他靠着个人的勤奋自学，由中专而大专，由大专而本科，一步一个脚印，书籍就是他的良师益友，他所付出的辛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现在，他已经是大学教授了，节奏本可以放慢一点，但他还是每天晚睡早起。看看他的现在，便可推想他的过去。除了专业之外，小荣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并且能阅读梵文佛典及法文方面的专业书籍。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已经超过了不少同一年龄段的同行。

其次，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转益多师，也是他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南开，小荣师从郝世峰教授打下唐宋文学的坚实基础；在复旦，他师从陈允吉教授，积累了较为扎实的佛典知识；在浙大，他又师从张涌泉教授，专攻敦煌学；在本流站，他回过头来做中古时期的重要文史文献《弘明集》与《广弘明集》。小荣先后进南开、复旦、浙大，受到这些著名学府良好学风的熏陶。他还不断广泛地向海内外的名家请教，及时关注学术界的动态，和同辈学者或年纪稍长的师友有较多的学术交往，并注意吸收他们的长处。

再次，小荣是以平常心来治学，不急不浮不躁，心平而气和。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是对思想家说的，或者是针对修身养性说的；韩愈的“气盛”，是对古文家说的。在我个人看来，做文史研究工作的人，似更需要有一个气和的心态。当今的社会，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善，令人困惑的地方不少。例如刊物的级别，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前者在一些院校被确认为国家一级





刊物或权威刊物，而后者不是；同样都带有“文史”二字的刊物，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被某些院校确定为核心期刊（我也是该刊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搜集有创刊以来几乎全部的刊物），问题是，创办更早的中华书局的《文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却不算，似有欠公平。但仔细想来，理由当然也是有的，因为后两种是以书代刊，有书号而无刊号，既然无刊号，怎么能算期刊？怎么能算核心期刊？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诸如此类，学者也当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待之。小荣研究的是佛教文献，是敦煌学，他有时也为所发表的刊物不太为评价体系所重视而有些不解，但他并不为此而烦恼、而愤愤然，论文该给《法音》还是给《法音》，该给《文史》还是给《文史》，该给《敦煌研究》还是给《敦煌研究》……总之是找专业对口的刊物。当然，面对纷繁复杂的评价体系，适应“游戏规则”有时也是需要的，但过于趋时恐怕未必是好事。评价体系之外，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诱惑，奖项、荣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一个正直的学者除了应有自己的学术评判和学术价值观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最后，小荣治学路子正，方法对。路子正，是指做学问从认真读书开始。我这里说的读书，是指读研究某一方向的基本文献、基本典籍。例如小荣研究佛学，《大藏经》是他的必读书。由于研究佛学，他还得读儒家的经典和《道藏》，才能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加深对佛学的理解。读书是一件很花时间的的事，但不多读书，多思考，你怎么会发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关于研究方法，《〈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中有多处提及，例如第二章《永平求法说平议》就有一节《研究史述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来专谈这一问题，兹不赘述。我以



为，研究方法有时是和研究态度相关联的，躁竞的心态，躁竞的功利目的，其研究方法难免令人生疑。十余年来，小荣沉住气，心不旁骛，脚踏实地，潜心做他的学问，故而能走上学术研究的正道。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的出版，是小荣学术研究日渐成熟的一个标志。小荣已经掌握海内外《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的多种版本，整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他现在才三十五六岁，日后学术研究的路子还很长很长，我不敢以什么“大家”之类相期许，但我相信他能进一步开拓眼界，不仅博采国内学者之众长，而且能吸收国际汉学家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必汲汲于一日之短长，继续沿着自己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天地必然是宽阔的。学术研究，只有三分的耕耘，不可能有太大的收获；十分的耕耘，即使没有十分的收获，至少也会有六七分吧？不知小荣以为然否。

乙酉暮春于福州烟山南麓华庐



## 前 言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华书局就把《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排入了需要整理研究的佛教典籍之列，但直至今日也未见其成果出版，不知何故。我想大概是与研究的难度之大有关系吧。因为两书牵涉的内容极其广泛，凡是要研究中古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宗教史等学科的学者，无人不要用到其中的珍贵材料<sup>〔1〕</sup>。因此，要高质量地完

---

〔1〕 清人永瑆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五《子部》“释家类”即说《弘明集》的作用是：“然六代遗编，流传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终胜庸俗缩流所撰述。”评《广弘明集》则为：“其书采摭浩博，卷帙倍于僧祐。”（第 123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由此可见，前人早就注意到了二书在保存中古历史文献方面的巨大贡献。二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其用大焉。于此，仅举三例：一者如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今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皆利用了二书中的大量文献资料；二者如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明寿等人所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中，就有不少论文是选自《弘明集》与《广弘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并对它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释，极有助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三者如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二卷（同前，1985 年）、第三卷（同前，1988 年）中亦对两《弘明集》中的一些重要论文作了重点分析，如《牟子理惑论》、孙绰《喻道论》、郗超《奉法要》、宗炳《明佛论》、张融《门律》、甄鸾《笑道论》、道安《二教论》等。



成二书的整理工作，需要整理者有相当深厚的学术根底，综合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全面把握二书所包孕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历史信息。

就笔者浅陋所知，目前国内外对二书的研究，主要的成果表现在《弘明集》，对《广弘明集》的研究则尚无专著问世，仅有一些零散的单篇论文发表。我想原因或在《广弘明集》的内容远比《弘明集》丰富，整理与研究的难度也大得多。因为《弘明集》中所收论文仅有180余篇（作者122人），而《广弘明集》所辑论文达300多篇（作者130多人），容量多了一倍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也更多。

关于《弘明集》的研究，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日本学者牧田谛亮主编的《〈弘明集〉研究》<sup>〔1〕</sup>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著作，它对该书的语源考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不唯是日本学界研读《弘明集》的最重要的工具书，对中国学人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思想研究方面，目前所见，则以刘立夫博士的《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最为全面<sup>〔2〕</sup>。至于《广弘明集》的整理与研究，则缺乏系统性。全

---

〔1〕 牧田谛亮主编《〈弘明集〉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4年。

〔2〕 刘立夫《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面的文献整理之作，尚未问世<sup>〔1〕</sup>。只有部分学者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单篇论文，进行过专题研究<sup>〔2〕</sup>。

《弘明集》的作者僧祐（445—518），是齐梁时代的律学大师，同时也是中古时期最杰出的佛教文史大家。其著作除了十四卷《弘明集》外，还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等。其中与中古思想史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莫过于《弘明集》了。

《弘明集》的宗旨，僧祐自己在《〈弘明论〉后序》中交待得十分清楚，他指出时人对佛教有六种怀疑：“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sup>〔3〕</sup>这六疑其实都是当时儒、道两家攻击佛教的焦点。如第二疑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神灭不灭之争

---

〔1〕 最近出版的《中华大藏经》第62册至63册中收有《广弘明集》（见第62册，第938—1082页，此为前十卷；第63册，第1—466页，此为第11—30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它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存24卷，抄补1卷），校以其他八种《大藏经》（《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碓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写出了校勘记，相对于《大正新修大藏经》主要只校以《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三种藏经，对于研究者的帮助则更大。但无论是《中华藏》还是《大正藏》，其校勘记中都没有断语，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献研究。另外，《弘明集》在《中华藏》中是收在第62册（见第708—937页），校勘版本与《广弘明集》相同（在《大正藏》中也一样）。

〔2〕 除了前面注释所提到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国佛教史》中有对《广弘明集》中的单篇论文进行注释或研究外，外国学者也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工作，如对甄鸾的《笑道论》之研究，就有日本“六朝·隋唐時代の佛道论争研讨班”所作的《〈笑道论〉译注》（载《东方学报》第60册，第481—636页，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8年）、Livia Kohn的 *Laughing at the Tao—Debates among Buddhist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5）。

〔3〕 《弘明集》卷十四，见《弘明集·广弘明集》第96页，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的问题，第五疑则是夷夏之争的问题。当然，从佛教立场看来六疑皆是异端。僧祐撰集《弘明集》的宗旨，就在于排斥这些异端，为佛教辩诬御侮，从而达到弘道与明教的目的。

道宣（596—667），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戒律学大家，他是南山宗的开祖，同时又是继僧祐之后的佛教文史大师。其著作：关于戒律方面的主要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量处轻重仪》、《释门章服仪》、《释门归敬仪》、《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律相感通传》、《释门正行忏悔仪》、《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净心诚观法》等；关于佛教文史方面的则有撰成于贞观十九年（645）的《续高僧传》，撰成于永徽元年（650）的《释迦方志》，撰成于显庆五年（660）的《佛化东渐图赞》一卷（今佚），撰成于麟德元年（664）的《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撰成于麟德二年（665）的《释迦氏谱》等。其中《广弘明集》是有意继承僧祐《弘明集》而撰作的，但在体制上却稍异于《弘明集》。《弘明集》分卷不分类，《广弘明集》除了分卷外，还按照所辑论文的性质分成十类（十篇），即《归正篇第一》、《辩惑篇第二》、《佛德篇第三》、《法义篇第四》、《僧行篇第五》、《慈济篇第六》、《诚功篇第七》、《启福篇第八》、《悔罪篇第九》、《统归篇第十》。每篇之前，皆冠以小序。而且道宣在《广弘明集》中还用这十种分类法给僧祐《弘明集》所选的论文分类列目，并把它们收在除“诚功”、“悔罪”之外的八类论文的目录中。复次，《弘明集》在选辑古今论文时，僧祐自撰的序文只有三篇，即开头的《弘明集序》、末尾的《弘明论后序》以及卷十二开头的一篇小序，而《广弘明集》之十大篇之前都配有道宣自撰的小序，加上总



序则有11篇之多。可见《弘明集》主要是选辑，而《广弘明集》则把自己的观点和选辑合二为一，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佛学观，也使读者更方便了解当时思想界的关注点之所在。兹把各篇的内容略述于此：

《归正篇》主要是从儒、道、释三教的比较出发，得出了佛教独尊的结论，这和此前常常调和三教的观点有所不同，显示了当时佛教一方的自信，因为随着隋唐之际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其理论已经成熟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儒、道两家比起来则要逊色得多。《辩惑篇》则针对魏晋至唐初这一历史时期教外人士不相信佛是圣人、不相信佛法是实在而产生的一些疑惑进行分析，指出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二：一是因为世人未能好好地研习佛理，二是世人常惑于道家学说，所以才要加以辩解。《佛德篇》则将有关描述佛之祥瑞与颂扬佛之盛德的论文选辑在一起，用以启发人们对于佛教的崇敬和信奉之心。《法义篇》则把晋唐之际辩论佛教二谛义、法身义、神不灭义等教义的争论文章辑在一起，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僧行篇》选辑的是晋唐之际描述有关高僧大德行事的论文，宣扬的是他们的护法精神。《慈济篇》所辑论文，则以宣扬佛陀施教、首重止杀的训诲，来培养世人的慈悲情怀。《诫功篇》所辑论文，则以宣扬戒律之大用为主，旨在说明守戒的无量功德。《启福篇》则谓佛教以慈悲济世救苦，兴福无量，旨在宣扬佛教在治世与教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悔罪篇》所选文章，旨在说明诸佛大悲，不忍众生长沦生死苦海，故而倡导忏悔法使犯罪造恶之人得以改过自新。《统归论》所辑文章，多是对佛教的颂赞之作。由此可见，《弘明集》中所辑论文，主要是以破为主，破的是那些反佛的、或疑佛的



人，而《广弘明集》则破、立并举，既有对反佛者的回击之辞，也有赞佛者的颂扬之作。职是之故，道宣是书虽承僧祐《弘明集》而来，书名不曰“续”却曰“广”，体现了自己的创新特色。

《广弘明集》因了撰出时代之异，与《弘明集》相比，产生了不少差别，但是在思想内容方面相同的地方仍然不少，比如对化胡说、夷夏论、神灭不灭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论的争论之作，皆是二书重点讨论的内容。因此，本人研习两《弘明集》时也把关注的重心集中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上，以求对中古时期的三教思想，特别是佛、道思想的关系进行探源性的研究。当然，由于《弘明集》中所辑录的论文，有的年代相对早一些，存在着真伪的论争。所以，本人还想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如《车子理惑论》进行重新检讨。易言之，本人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大内容，即：一大内容是对《弘明集》所辑论文本身的文献学研究，这方面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对《车子理惑论》的真伪的探讨，二是对《弘明集》的撰成经过的研讨，因为《弘明集》不像《广弘明集》那样有明确的完成时间；第二大内容则是对《弘明集》、《广弘明集》中共同的思想问题进行讨论。不过，由于时间的仓促，尤其是自己的学养严重不足，故而只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讨：一是化胡说，二是夷夏论，三是因果报应说，四是形神论，五是道教《灵宝





经》与相关佛典之关系<sup>〔1〕</sup>。这五个问题中，前面四个悉与三教有关系，所以又成了我研究对象的重中之重，所用的笔墨也最多。但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则尚祈有识之士、博雅君子多多赐正。此外，关于永平求法的传说，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桩公案，《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中涉及此事的论文也不少，因此，我也列了专章加以检讨。

我在研讨二集中涉及佛、道二教关系的问题时，始终有件事情不太放心，那就是道经的年代问题。正如日本前辈道教学者窪德忠先生所说的那样，道教经典“编著者姓名和编著年代大多不详”，而“不能确定年代就无法作为资料使用”，“仅确定一部经典的年代，就得耗费大量精力”<sup>〔2〕</sup>。而我对道典的了解十分有限，又绝非什么专家水准。因此，在确定中古时期的相关道经的编著年代时，常常是参照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之间的说法往往又不一致，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即指出：“道教史中至今还没有称得上‘定说’的东西。”<sup>〔3〕</sup>而

〔1〕 本来沙门敬不敬王者的论争也是两《弘明集》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我自己又没有什么新见，故不再检讨。其中关于《弘明集》的，可参看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三章第六节《慧远的佛教思想体系》之第一小节（第631—641页）、彭自强的《佛教与儒教的冲突与融合》之第六章《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第213—25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刘立夫的《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之第六章《〈弘明集〉中的沙门与王权之争》（第204—243页）等；关于《广弘明集》的，则可参看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第1—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日本学者砺波护的《隋唐佛教文化》第四章《唐代贯彻僧尼拜亲政策始末》（见砺波护著，韩昇、刘建英中译本第87—1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的相关论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隋唐之际关于沙门敬不敬王者的争论，就理论的深度而言，并没有超过东晋时期的讨论。

〔2〕 窪德忠著，萧坤华译《道教史》第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